

回憶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

(初稿)

祝敏申

1979年，一群愛好古文字學和上海高校學生和青年研究人員建立了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出版了自己的油印刊物《古文字》。三十七年過後，每念及此，仍感慨萬千。

據我的記憶，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成員有上海博物館的濮茅左，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陳建敏，華東師大的王貽樑和姚平，上海師院的陳健兒，及復旦大學吳旭民、黃敏、葉保民和我本人。

三十多年前的背景是，中國開始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改革開放，學術界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中國古文字學是其中的先行領域之一。當時，直承“四堂”的老一輩學者們健在如老驥伏櫪；中年學者如李學勤老師、裘錫圭老師等已成爲重鎮中堅；在“文革”中經歷磨難刻苦自學的青年學者如李家浩、沈建華、李零、吳振武和劉釗等已嶄露頭角。一時人材鼎盛，群星燦爛。中國古文字學，在傳統小學與現代語言學、史學與文獻學、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等學科的相互結合、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已發展成爲一門獨立成熟並成果豐碩的前沿學科。

在歷史大背景下，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有它成立的直接起因。

一是中國恢復高考，我們這一批人成爲77或78級大學生，進入學術園地；還有一些自學成材的青年，直接進入專業學術機構。這使我們這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古文字學愛好者，有了聚會切磋的良機。

二是當時的大學校園剛冲破了“文革”形成的萬馬齊喑的局面，德高望重但受盡磨難的老年教授、筆路藍縷的中青年教師，蹉跎多年的新入學學生，大家的學術研究和求學熱情如同井噴，共同迎接科學的春天。

如我所在的復旦大學，學術風氣非常濃厚且純樸，給予勤奮向上的學苗以豐潤而扎實的沃土。我們這些本科一年級新生，當年是有機會直接向郭紹虞先生、周谷城先

生這樣的一級教授趨庭求教的。他們對我們這樣的青年人也是充滿了熱情和期望。在中文系的文學專業，有盧新華同學能開中國文學史上的“傷痕”之風；在中文系的語言專業，則有我們這幾個對古代音韻訓詁文字之學極感興趣的學生。如大家所知，甲骨學權威胡厚宣教授是從復旦調去中科院歷史所的，裘錫圭老師也是從復旦去了北大。恢復高考後，中文系副主任兼語言教研室主任許寶華老師有意在復旦重振古文字學，對我們這幾個學生抱有很大希望。在我進校第一年的1978年5月份，復旦大學舉行了“文革”後的第一次校慶學術報告會。我被安排與張世祿教授和濮之珍老師等同在語言學專場，宣讀了自己的習作論文《試論〈說文解字〉與許慎學術思想的進步性》，成爲復旦大學登上全校學術講壇的第一個本科一年級新生。之後此文發表在《復旦學報》1978年第2期上。回頭看這篇小文，確有很不成熟之處。但這樣的經歷，的確印證了當年復旦激勵學子上進的優秀學術風氣。

三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舉行老中青幾代同堂的中外國際學術研討會，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同時，我們這些學生，曾經有求教過古文字學界專家的寶貴經歷。如我在上海一家紡織廠當工人時，曾揣着自己幼稚的習作，在紫禁城裏拜訪過李學勤老師。進復旦前借調在《歷史研究》編輯部時，在北京拜訪過胡厚宣教授、裘錫圭老師和沈建華等。我們非常想做些事向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表達自己的心願和志向。

所以，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成立是應運而生的，也是各位同好一拍即合的。

當時復旦大學很支持我們的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但我們沒有得到過也沒有認真想過如何去爭取經費投入。大家各處聚會，輪流坐莊。也從來沒有明確過誰是“社長”，各人都願意盡其所能爲學社多做些事情。我們的主要活動是：

其一，社員交流切磋並自刻自印了《古文字》油印刊物。方式非常簡單，每人把自己的文章刻在蠟紙上，集合在一起就成了刊物。第一期刊名是復旦中文系同學樓鑒明的法書，第二期開始用周谷城教授的題名。大家把這份油印刊物分送到有關機構和各自比較熟悉的學者處。

上海博物館沈之瑜館長幫助我們把這份刊物送給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年會。沒想到，年會對這份尚爲幼稚的刊物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支持，專門發來了賀信。賀信說：“希望青年同志們勤奮讀書、刻苦鑽研，努力學習和繼承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治學方法，勤於探索，勇於攀登，爲我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作出貢獻。”年會還將此事列入紀要(草案)。多位學界泰斗和老師來信祝賀、支持並賜教。其中有于老(省吾先生)、胡老(厚宣先生)、李學勤老師、裘錫圭老師、管燮初老師、王世民老師、王春瑜老師和鄒衡老師等。于老說：“古文字這門學科，我本來以爲青黃不接、後繼無人而焦慮，現在你們這樣熱情壯學，使我十分愉快。”李學勤先生認爲：“(《古文字》)可稱

是一朵江南新葩。希望這個刊物能長期辦下去,不斷放出異彩。”前輩老師的鼓勵和厚望使我們十分感動。

這份刊物據我的記憶出了五期,其中第五期的封面出現了“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和“上海商業二局電大中文系”兩個編者名字,應是後者當時提供了印刷便利等贊助。這五期刊物中不僅有社員自己的習作,還有老師們賜給《古文字》發表的大作,如李學勤老師的《魯器帥鼎考釋》,這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激勵;有前輩的未發表過的手稿如楊樹達先生的《訓詁學》;有對外國學者成果的翻譯,如姚平譯伊藤道治之《新出土金文資料的意義》,等等。一個值得記錄的學術佳話是:在當時兩岸學術文化交流非常稀少的環境下,陳建敏兄發表的研究董作賓(彥堂)先生的文章,竟引起了嚴一萍先生的關注,特地輾轉送給建敏由藝文印書館出版的《董作賓先生全集》。

其二,舉辦普及型古文字學講座,如我和葉保民同學曾在復旦校園裏舉辦過面對全校學生的甲骨文基礎知識講座。本科學生舉辦這樣的講座在當時很引人注目。我非常感謝那時李學勤老師曾斧正過我的講稿。

其三,向訪問上海的中外學界老師們請教,我的記憶中這些先生有胡厚宣教授、李學勤老師、張光裕老師和巴納老師。

其四,在各自崗位上相互幫助。如濮茅左兄所在的上海博物館金石組,陳建敏兄所在的上海社科院圖書館,都是我閱讀寫作的主要場所,那裏查閱專業資料比當年的復旦大學圖書館方便許多。這樣惺惺相惜的友誼保持了很久。直到我畢業後在復旦分校任教編寫《大學書法》時,茅左和姚平仍給我提供幫助。

其五,向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年會提交論文並爭取派出代表參加。我記得自己在1980年受到第三屆年會邀請後向班級輔導員申請去成都開會時,輔導員告訴我,復旦對本科生能出席國際研討會當然是支持的,但出車票是不可能的,因學校科研經費只有給教師這項,沒有給學生的。所以,我能爭取到最好的支持是,能給予公假缺課,但路費要自理。那時,我是有九年工人工齡的帶薪學生,一個月的工資是四十多元,而上海到成都的來回卧鋪車票是六十多元。但我覺得這是自己珍貴的學習機會,在家庭的支持下還是去了。

我曾有幸代表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參加第三屆(成都)和第四屆(太原)年會,宣讀了自己的論文,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前輩老師們,並認識了當時的學界青年朋友們。這些當年的照片,彌足珍貴。坐在徐中舒教授、胡厚宣教授和李學勤老師身邊宣讀自己的習作,當時簡直就是在夢中。在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上,我有幸結識了當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從事研究的張光裕博士,他又把我推薦為巴納老師的博士研究生。巴納博士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高級研究員和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他力薦我

獲得了全額博士獎學金。因而我於 1984 年來到澳大利亞，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迹。

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大致在八十年代初期 77 級學生畢業離校後停止集體活動。社員們有的繼續在國內學術領域研究或工作，有的離鄉背井，各自東西。其中最可惜的是陳建敏學兄苦讀成疾，英年早逝。而不才者如我，歲月蹉跎，學業無成，有負當年師友的厚望。但無論如何，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是當年中國古文字蓬勃發展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可以從一個小側面來看中國古文字學發展的歷史長河，值得一提。特別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極為重要，這段歷史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在建立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二十年之後的 1999 年，我終於有機會發表自己的雙語專著《〈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這部專著源自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論文。博導是巴納老師，副導師是張光裕老師。光裕老師去香港中大後，副導師換了另一位院士——澳國立大學的語言學權威溫蒂梵。

我還想在此說明，在感謝巴納老師給予我這樣優越條件來世界名校攻讀博士的同時，我還要感謝巴納老師請來李學勤先生在訪問澳國立大學時指點我的論文。我在這部論文中對許慎提出的文字發展體系的看法，直接受到了學勤老師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文明學術思想（我所稱的“新古文學派”）的非常大的影響；這部論文對《東周文字譜系》的耕作，直接發軔自學勤老師《東周與秦代文明》中對先秦“文化圈”的論述。我所做的只是把學勤老師對各種文化物質的排隊分類方式，運用到文字形體結構的分析中。學勤老師肯定我把戰國文字異形特點上溯到春秋中期的觀點，使我甚感振奮。學勤老師在訪問期間如導師般全文指點了我的論文稿，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忝列為學勤老師的學生，雖然沒有過任何正式的學生名義。

1988 年論文完成後，巴納老師和澳國立大學請了李學勤老師、饒公選堂和哈佛張光直教授三位大師級學者作我的評審委員。他們一致給了我免於答辯通過的結果。所以，我的博士學位和這部書，可以說同當年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時期有着直接的歷史淵源。非常感謝學勤老師、光裕老師、錫圭老師、憲通老師、世民老師、樹青老師和吳振武兄等在 1999 年 2 月 28 日特來北京釣魚臺光臨首發儀式，見證了這二十年完整的因果。此情此景，令我更加懷念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那段日子。

希望當年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同道們，無論各位在天涯海角何處，如果能看到這篇小文的話，再相約一聚，彌補這篇小文中的記憶缺失，共同回憶和提供更多的學社史料。

此文根據提交給 2008 年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 30 周年長春大會的發言稿整理而成。